

“一带一路”背景下重庆民族民间音乐对外传播初探

◎徐琳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文化交流和互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一带一路”背景下，重庆民族民间音乐也应借此良机进行对外传播和创新传承，构建跨文化传播内容体系、构建差异化传播模式以及立体传播手段，依托战略平台，打造重庆音乐文化特色品牌。

关键词：“一带一路” 重庆民族民间音乐 对外传播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为贯彻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文化和旅游部下发了《关于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计划”民族音乐舞蹈专项扶持工作的通知》。该计划积极鼓励国内艺术团队创作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艺术作品和相关演出，大力扶持艺术团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城市进行艺术传承发展和文艺传播。各地方积极响应国家方针政策，纷纷颁布战略行动方案。2015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了《重庆市“一带一路”倡议行动方案（2015-2017年）》的通知，其中提到加强文化旅游合作，扩大与沿线国家在文化体育、文艺演出等交流，推动特色文化“走出去”。这些时代政策背景给重庆民族民间音乐进一步传承、发展与海外传播带来了极大的机遇和挑战。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重庆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播价值

（一）文化交流价值

“一带一路”战略方针给我国文化交流与互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这既是推动重庆民族民间音乐海外传播及深化传承的重要机遇，也是重庆民族民间音乐积极走向世界的战略机遇。重庆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民族民间音乐种类繁多、体裁众多，有丰富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庆民族民间音乐从地理位置划分为西南主城区、东北三峡库区、渝东南片区。其音乐种类丰富、历史悠久，有深厚的音乐文化底蕴。渝东南地区有石柱县的土家族啰儿调、断头锣鼓、川江号子、斗锣；彭水县的鞍子苗歌、娇阿依；秀山县的秀

山花灯、劳动歌、农事歌、山歌；武隆区的后坪山歌、鸭平吹打、仙女山耍锣鼓、平桥薅秧号子；酉阳县的木叶情歌。渝东北地区有城口县的三人锣鼓和薅草锣鼓；云阳县的新津船工号子、打夯号子和五句子歌；巫山县的龙骨坡抬工号子；万州的锣鼓乐、高腔山歌、灯调小调、婚嫁歌。西南主城区有巴南接龙吹打。这些民间音乐彰显了巴渝特色和地域文化。

（二）文化传承价值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传承和对外传播重庆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是本地音乐教育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文化互通交流需要对重庆诸地区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挖掘，开发民间音乐资源，整合地区优秀音乐资源，选择适合传播、弘扬的音乐类型音乐代表作品。尤其是对于目前研究开发比较有限的土家族民歌、巫山龙骨坡抬工号子、木叶情歌、接龙吹打、高腔山歌等，给予更多开发、传承与保护。因此整合、梳理重庆地区优秀音乐资源，在此基础上通过国际媒介传播，能有效推动重庆传统音乐文化的挖掘、保护与传承。与此同时，有着深厚音乐文化底蕴的重庆民族民间音乐，一定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促进重庆民族民间音乐发展，提升重庆直辖市的城市自信心。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重庆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播局限

（一）音乐文化认同不足

“一带一路”背景下进行民族民间音乐传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沿线国家对该音乐文化是否认同，这样才有利于推进民族音乐在沿线国家的传播。但是重庆地处内陆，四周环山，音乐文化丰富却鲜少对外传播，同时受当今多元文化冲击和现代音

乐的影响，重庆本地区人民自身对于民间音乐认同不足，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特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不够。如川江号子中对万州船工号子的研究传承与保护比较多，但是对打夯号子、抬石号子研究和开发相对较少；在民歌中对秀山花灯与彭水鞍子苗歌的研究较多，对于土家族婚嫁歌、劳动歌等研究较少；在民间锣鼓乐巴南接龙吹打与城口三人锣鼓等都有待进一步开发。因此，对民族民间音乐挖掘深度和广度不足，严重制约了跨文化传播的内容选择与输出自信，成为阻碍重庆民族民间音乐传播的首要困境。

（二）跨文化传播载体不足

不同音乐文化都有相对稳定的文化生态环境和传播方式。重庆民族民间音乐往往以口传心授、现场展示为主来传播。例如彭水鞍子苗哥娇阿依以苗语（酸话）演唱，采用口口相授的形式传承，主要的传播形式是以民俗节日、群体聚会的现场展示为主，以融入中小学教育传承为辅，传播载体有限。众多的重庆民族民间音乐具有特定的区域性，如果进行跨文化传播则必然需要借助传播工具，借助于现代大众传媒等技术。欧美发达国家民间音乐的传播现代传媒技术上一一直优先于我国互联网，我国的媒体传播载体不足，传播过程以惯用的中国思维，是否符合沿线国家人群的文化接受习惯，传播内容是否针对性，这也成为制约重庆民族民间音乐跨文化传播的阻碍。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重庆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播路径

（一）构建跨文化传播内容体系

重庆民族民间音乐对外传播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打破惯用老套的传播模

式，祛除传播过程中的“官方喉舌”姿态，打破“我想传播什么”“你应该知道什么”的传播误区，而是在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音乐文化接受习惯，充分挖掘重庆民族民间音乐特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选择适宜于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内容。

（二）构建差异化传播模式

“一带一路”沿线有65个国家和地区。在传播过程中，我们需要正视各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选择具有一定文化认同基础的周边国家以及易于接纳多元文化的国家作为突破口，依托战略平台，更深层次开展文化交流。我们需要深入了解传播国家的民族性格和音乐文化接受方式，了解当地民众的文化形态、思想意识、风土人情等，并针对不同差异的国家地域有针对性、有倾向性地制定内容，选择传播国乐于接受的传播方式，深入其日常生活中进行传播。在传播载体选择上需要结合传播对象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如在新媒体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大众媒体对接，而在不发达国家可以采取传统模式进行传播；在传播广度和深度上，选取区域性、阶段性、循序进行的传播模式，选择重要的区域以点带面进行传播，有阶段性循序渐进地进行音乐文化推进。


（三）构建立体传播手段

新时代背景下，在传播手段上不仅要关注传播平台的整合，更要关注传播手段的产业化。重庆民族民间音乐“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需要运用多元传播手段，联合政府、企业、民间社团、教育、个人、媒体等多元平台进行深度传播。政府手段多指借助政府，重视重庆民族民间音乐的跨文化传播，通过文化交流、政治访问等形式实现传播。企业手段则是将重庆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让传播对象国在产品消费过程中体验重庆民族民间音乐。民间社团手段则是运用社团的交流和音乐交互实现音乐互动。教育手段则是将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孔子文化学院进行一定程度的重庆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传播，通过开设相关的课程、展览、讲座和演出等为其传播奠定基础。个人、媒体手段则是运用网络、自媒体、电视等信息

技术手段进行重庆音乐文化宣传。单一的传播手段效果是有限的，因此还可以将重庆民族民间音乐以不同的主题打造产业型的文化交流形态，实现其与企业产业、旅游产业、演艺产业、影视产业等的联动式发展，从而最终提升跨文化传播话语权，增强重庆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产品的表现力。

本人在前期研究中，收集整合了重庆各地区的民间优秀音乐作品视频以及部分打造作品，在国外大型互动博客“推特网”“油管”视频网和“INS”网站上，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设了名为“重庆民族民间音乐之窗”的专栏，自2020年11月开设以来，受到沿线国家不少音乐粉丝的欢迎，点击率较高，也收到不少评论，内容主要是对重庆民间音乐的喜爱和对原生态音乐的尊重，他们也提出了很多对民间音乐感兴趣的问题和话题，有些关注者甚至给我写信留言表达对民间音乐的喜爱，从整体反馈形式上更倾向于喜爱将民间音乐改编打造的现代音乐风格形式。对于如何更好地在专栏中宣传重庆民族民间音乐以博得更多人的关注和喜爱，诸此内容本人及团队在继续研究中。

四、结语

“一带一路”背景下重庆民族民间音乐传播研究是对现有重庆民族民间音乐传播的重大拓展与补充。它预示着“重庆民族民间音乐”将遵从“一带一路”发展规律与文化交流、认知发展规律，从传统内部传承和保护，转化为对外弘扬重庆民族民间音乐特色的传播研究。该研究以文化和旅游部相关文件为指导，以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实践为基础，以探索音乐文化传播为核心，以“一带一路”倡议下重庆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传承与保护研究为重点，探索未来重庆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传播方向，尊重沿线国家的文化差异，强调多元、多渠道的音乐文化发展，通过多平台，打造重庆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品牌。

参考文献：

[1] 曹姝莉.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原音乐文化海外传承构想[J]. 音乐创作, 2018(3).

[2] 李宝杰. “一带一路”：区域民俗音乐文化的机遇与挑战[J]. 音乐研究, 2016.

本论文隶属于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重庆民族民间音乐的国际媒介传播研究》(编号: 2020TBWT03)。

作者单位：长江师范学院音乐学院